

# 日治時代台灣史的研究定位

張炎憲

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
## 一、研究的外在困境

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，深深影響台灣的發展。但長久以來，我們忽視這段歷史的存在，且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加以評斷，失去面對歷史事實所應有的公正性，喪失基於歷史發展所應具備的長期觀察反省的能力。會造成這樣的失調，與台灣政權變動頻繁，歷史常被切割成片斷，難窺歷史發展的真相有關。

每個政權都有其歷史解釋的架構，藉此合法化政權的存在法理和基礎。國民政府遷台之後，面對中共的挑戰和台灣民心的不穩，如何在台灣重建新政權、穩住陣腳，便成為當務之急。

中國大陸人民大多具有長期抗日的經驗，背負遷徙流亡的痛苦，自然產生仇日、恨日的感情。他們來到台灣之後，眼見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多少已摻雜日本人色彩，乃亟思去除，斬斷台灣人和日本的關連性；以建立中國為主流的社會價值觀，重建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穩定性。

為了達成政權的重整工作和建立新的威權，國民政府在台灣厲行中國民族主義的教育，詮釋日治時代台灣的抗日運動多是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感情，而忽視台灣人本土意識的存在。這種盡量吸納中國歷史架構的做法，扭曲淡化了台灣歷史文化的自主性。

台灣人民歷經二二八的悲痛，對國民政府的統治產生不滿和失望，激起部份人士懷念日本統治時的法治秩序、清廉守法的社會風氣，對日本產生親近的感覺。

老一輩台灣人和大陸人、官方對日觀點的差異性，蒙蔽了對日本應有的冷靜觀察力。在官方中國本位教育政策之下，日治時代台灣史成為歷史的空白，年輕人不知這段歷史，老年人只能在記憶中尋味。

## 二、海外研究的延續

在國內無法充分獲得台灣史知識的情況下，台灣的留學生遠赴海外之後，受到當地民主政治風氣和國際現實的衝擊，開始反思台灣的前途，而極欲瞭解台灣歷史，有些人乃投入台灣史的研究，尤其是充滿歷史空白的日治時代。

留學生研讀台灣歷史，是想探討日本殖民政策的本質、台灣人意識和反抗精神、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和思想內涵、台灣資本主義化的發展、台灣文學藝術的特質、大戰體制下的台灣社會等課題，並欲藉這些課題的探討，重建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，以及批判反省國民政府的統治及其影響。

留學生滿懷求知的熱情和對台灣的關切，所寫出的論文和著作，突破了國內政治思想的禁忌，為台灣史研究打出一條新的途徑。這些作品，如王育德《苦悶的台灣》，史明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，許世楷《日本統治下的台灣》，黃昭堂《台灣民主國的研究》等，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，都被列為禁書，無法傳入台灣，但其影響却深遠而長久，左右海外留學生的思維、海外留學生運動和八〇年代之後國內的台灣史研究。

每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，參與者都需具備無比的熱情和理想的執著。留學生遠在海外，雖然有家歸不得的恐懼，但海外自由的天地任他遨遊，逐漸擺脫國內的局限，開拓出新的研究視野。

留學生遠離鄉土，久居異國，敏銳的批判性固然是其所長，但沒踏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，研究鄉土的歷史，總有無法落實，無法掌握台灣發展脈絡的遺憾。這樣的缺憾，使得海外台灣史研究發生後繼無力、營養失調的現象。

一九七〇年代中葉之後，國內台灣史研究風氣的再起，適足接替了海外台灣史研究的火力。八〇年代之後，台灣史研究的熱潮，象徵台灣史研究的主力已回歸他的故鄉。

## 三、研究新領域的興起

一九八〇年代之後，台灣的政治禁忌漸被打破，在本土意識高昂之下，台灣史研究日漸興盛，日治時代台灣史也開始受到學界的重新評價。

近年來，省文獻會所藏日治時代檔案、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文書、台灣大學的珍藏都展開計劃性的整理工作，這些資料檔案的逐步公開，有助於日治時代台灣史的研究發展。

這幾年來，研究日治時代台灣史比較有成果的，大概有幾方面：

#### (一)政治社會運動：

台灣民主國、乙未抗日、初期武力抗日及一九二〇年代之後的政治社會運動均有專論、單行本出現。《警察沿革誌》中譯本的完成、口述歷史資料紀錄的出版、回憶錄或傳記的刊行，使得台灣領導菁英、路線、左派運動思想的研究獲得極大突破。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已超越過去的研究水準。

#### (二)文學藝術：

由於台灣文學的定位一直倍受爭議，使得台灣文學史的研究遲至最近，才出現研究賴和、楊逵、吳濁流和當時文學雜誌作品、文學團體等專論。這些論文大多從其作品中兼論作家的意識型態、政治走向和本土關懷。

日治時代美術運動資料的整理、藝術家作品的出版和畫派思潮的研究開啓台灣美術史研究的新觀點、新領域。研究者試圖從日本畫、西洋畫的影響中，找出台灣美術創作的心靈、風格和自主性。

#### (三)台灣和海外關係：

關於台灣籍民在福建的活動、日本的對岸經營、泰益號的研究、華僑在台灣、台灣與日本的貿易等問題都有人研究，這些都是新的課題，新的研究成果。

除了上述研究之外，女子教育、鴉片問題、衛生政策、醫學研究、治理高山族政策、改良社會風俗及米糖問題等亦有論文專書出版。這些方面的研究雖然較少，却開拓出未來的研究方向。

## 四、研究的定位

從前，日治時代台灣史研究受到種種限制，無法茁壯發展。現今，這些禁忌逐一被打破，日治時代台灣史研究再也不會因政治理念、意識型態的不同，而不能研究。

面對新研究領域的形成，我們必須思考過去的研究成果。由於日本曾統治過台灣五十年，日本學界有些人也相當注意台灣史的研究，有人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的遺風，有人因有居住台灣的經驗，有些是老一輩教育出來的新世代，他們對台灣懷著好奇，想比較日本和國民政府兩個政權對台灣的影響，他們組成研討會，以集體力量探討台灣。天理大學、關西大學、大阪大學、中京大學、立教大學、東京大學、筑波大學等都有學者參與，提倡台灣史的研究。但他們大多站在日本人或日本國家利益的立場研究台灣，以殖民地的史觀或是中日夾縫中的台灣觀點來論著，很難以台灣整體歷史發展做為思考的座標。

在臺灣，由於官方政策大多以中國民族史觀看待日治時代台灣史，這種史觀雖能提供符合政策需要的論說，却無法掌握台灣歷史真髓和台灣社會變遷發展的脈絡。

面對一九九〇年代台灣主體性思潮的挑戰，如何在日治時代台灣史研究的課題中，思考重建台灣歷史的主體已是研究者自我反省的重要問題。

1. 從傳統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。台灣是漢人移民為主的社會，在十九世紀中葉歐美力量衝擊之後，清廷積極改變治台政策，這些措施雖然奠下基礎工作，但日本來台之後，以公權力有效率地導入資本主義的經營企業和設施，使得台灣漸漸脫離傳統社會。這是台灣社會經濟的重大轉變，研究探討這個問題，可以解釋台灣近代社會形成的動力和經由外力扭曲變形的實相。

2. 台灣民間社會力量的本質。台灣常受到外力干涉和政權轉變的痛苦，但民間社會經濟却不因外力而中斷，仍然一脈相傳地發展至今，這股潛在於民間的力量、穩定了社會的發展，維繫了台灣社會的連貫性。對這個問題的探討，可以解釋出台灣社會獨特性的所在。

3. 近代社會形成過程中，台灣人意識和政治文化力的成長與回應。日本導入新式教育，使得台灣人透過日文，瞭解世界新思潮，而反省自己卑微的角色，展開台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和新文化運動。這股力量的展現代表台灣人的覺醒、台灣人近代國民意識的形成和新文化產生的前奏。研究這些問題，可以解釋新生力量脈動的意義及台灣文化、台灣文學、台灣美術、台灣人意識等爭議性問題的歷史內涵。

4. 台灣史是界定於中國史範疇之內還是範疇之外，一直是爭論性的議題。日治時代台灣史研究正可做為檢驗的試金石。日本學者想以殖民地史來看台灣，中國本位主義者想以中國史來規範台灣。但實質上，台灣當時受日本統治，被統治的台灣人民却以漢人為主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雙元性，正是日治時代台灣史的歷史事實。面對這個問題，我們需要從這兩層角度來思考，不能否認日本統治的事實，但更需要瞭解台灣民衆的生活及漸漸形塑而出的台灣人近代社會。這已經不是日本史的範疇，或是漢人社會的範疇，而是二十世紀世界史的問題，台灣人民面對清日政權的轉變，接受世界思潮的洗禮，在近代社會形成過程中，對國家、社會重新思考定位，台灣的領導菁英提出許多自主、自決、獨立、農工階級和民族問題等開創性的見解，改變了台灣人的思維。這是世界史的問題，也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獨特性。日治時代所造成的台灣社會，如何延續至今，其間的連貫性和改變，也是研究的重要課題。

日治時代台灣史的研究可預卜會越來越受到重視。歷史定位、研究問題意識的重新反省也會越來越受到研究者或社會大眾的討論。

台灣主體歷史觀的提出，需通過論爭辯駁，才有可能成立。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來臨，就在我們眼前，需要大家更深思熟慮，迎接挑戰。